

城市经济学

Urban Economics

上 卷

饶会林 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城市经济学

Urban Economics

下 卷

饶会林 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Urban Economics

城市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

(上 卷)

饶会林 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城市经济学

(下 卷)

饶会林 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经济学/饶会林著.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7
ISBN 7-81044-503-0

I. 城… II. 饶… III. 城市经济学 IV. F2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3289 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 217 号 邮政编码 116025)

网 址: <http://www.dufep.com.cn>

读者信箱: reader@dufep.com.cn

大连海事大学印刷厂印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718 千字 印张: 28 5/8 插页: 4

印数: 1—1 0000 册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叶知秋

责任校对: 孙 萍

封面设计: 冀贵收

版式设计: 刘瑞东

定价: 40.00 元(上、下卷)

饶会林

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区域经济博士点教授

兼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大连城市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

1932年9月出生於湖南省桃源县

1954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学院统计系（沈阳）

1981年起在高校从事城市经济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1985年任硕士生导师

同年获大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199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

任博士生导师

同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系统“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1995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荣誉

近20年来

在我国城市经济学的开拓和发展过程中

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

对城市经济的理论和实践、

共性和特殊性问题进行广泛研究

已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

出版专著

教材多部

分获国家级

省部级

高校和市级各类各等级奖励与荣誉称号31次

城市经济学是一门集城市
发展、环境、效益、区域管理的综
合科学。它的出版将有助于促
进和推动城市的发展。进一
步的水平。

沈晓会林教授“城市经济学”的出版

王东
一九八八年
十月十八日

自序

记得一位资深的电影艺术家曾这样说过：“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即当作品完成之后，无法修改，只能空留遗憾。对此，我深有同感。不仅电影创作如此，其他学问的研究恐怕也是如此。作为国内首批城市经济学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从事这门年轻学科的理论 and 实践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不停地写文章、写讲义。但每次写完、发表之后，都有意犹未尽或词不达意的感觉。所以，一直未敢出版这方面的理论专著。这次，由于多方面的需要和催促，这本姗姗来迟的拙作，在三易其稿之后，首先要敬告读者的仍是：这本书仍然很不成熟。希望她能得到更多的批判，能激发出更多更好的佳作。这是本人“抛砖引玉”的初衷。

城市这个复杂体，曾使无数志士眷恋和迷惘。有人赞美她是“凝固的音乐”、“立体的图画”、“人类的丰碑”；也有人诅咒她是“罪恶的渊薮”；还有人认为：城市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时间与地域的屏障，宛若层层烟雾，叠叠纱幔，将它半遮半掩，留给人们太多的悬念与疑问”。我认为，造成这些扑朔迷离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城市演化规律未得到充分揭示之故。早在20多年前，即1976年，英国经济学家K. J. Button（巴顿）在其著作中就曾断言：“城市生活的复杂性仍然是研究工作迅速发展的严重障碍”，“由于多种原因，目前还不能发展出城市经济的基本原理。”（不知道他现在是否仍持这个观点）果真如此，我们就更应该充分

研究城市的各种现象，揭示并利用其规律。巴顿的话，反而成了激励我跃跃欲试的动力。

当我这样想这样做的时候，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如何理解城市化规律的两种实际对立的观点。有的同志提出了城市化规律应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的观点，甚至提出社会主义中国城市化应该避免走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弯路”。近年来，这些同志虽然不再这样尖锐地提问题，但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依然以“中国特殊”为由，未能正视和运用城市化的一般规律；而有的同志虽言必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被问到在城市建设、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和城市发展中究竟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特色”时，却都“顾左右而言他”，说不出实质性的内容。这些同志以引进西方的一些方法和个别结论为满足，却很少考虑是否符合中国城市的实际情况。这种状况实际上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两种思潮和观念的撞击。

我徘徊其间，在自己的“领地”上沉思。在按捺不住时，就或书面或口头地参与讨论，表明自己的看法。我的认识是：城市化规律、城市经济规律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相同的历史阶段，会出现基本相同的城市化规律、城市经济规律。这些规律具有普遍性，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都不能回避或“跳过”，但是在不同国家，由于条件的不同，也会出现规律的特殊性。规律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对立统一的。把规律的特殊性强调到否定普遍性存在的程度，同把规律的普遍性刻板地套用，否定其特殊性的存在一样，都是错误的、有害的。在这一争论过程中，我宛如处于潮流激荡之中：时而为波澜和涟漪中的湿润空气感到清新爽快，时而为浪花的拍打感到不适和震惊，有时由于没有注意到地面的坎坷不平，也会打几个趔趄。

与此相联系，我遇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城市经济理论著作应以什么理论基础为指导。在桌面上，谁也不会反对要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但实际上则有一种更强有力的新潮：要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指导。有一件往事使我记忆犹新：1986年我为城市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编写的讲义（初稿）部分脱稿时，一位“先睹为快”的北京青年学者马上给我提出一个问题：“饶老师，您是否胆子太小了？”“为什么？”我问其由。“我看你引用了那么多马克思的原话”，他坦然回答。毫无疑问，这位青年学者已经如此快地接受了西方理论著作的“规范”影响：不能有马克思的话！

1994年末，看到了樊纲同志编著的《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这位年轻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观点。他认为可以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统一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有助于更加全面而科学地解释经济运动的过程。尽管这一观点“能否经得住理论家们的批评，能否经得住经济现实和经济理论史的进一步检验，自然还有待时日”，我却为这种不谋而合的观点所鼓舞。因为在城市经济学领域里，我已经有意识地进行多年的实践，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十分有利于经济科学的发展。

1995年，理论界又出现了“理论范式”的争论。我同意以下观点：理论范式应是“某种统一的、被经济学家们共同接受的综合体系。”也就是说，理论范式一般应是共同规律的反映，而不是多多益善的门户之见。现在国内外已经有很多城市经济学的专著出版，但是，其体系差别之大超过了许多其他学科。这说明同行们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与基础理论方面，并没有达成很多共识。我这次的探索是否成功，也只是个“试探性气球”，我把所有自己的观点、方法都大胆地亮了出来，悉由读者们自由评说。

我之所以在自己晚年选择城市经济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事业和价值取向，主要是由于这门新兴学科的价值吸引力。我对她的情有独钟，源于我对她的特殊重要性的认识。

近百年来,经济和科技发展迅速,在学科建设上,其突出特点是学科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密切结合。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企业管理科学的迅速发展,经济学由理论走向实践,产生了研究单个经济单位和单个市场运行的微观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认为完全的市场竞争机制可以导致理想的经济均衡。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使这种幻想破灭,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兴起,美国罗斯福新政将其付诸实践,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由此推动了以国家为主体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到60年代,城市经济问题的日益突出,使经济学家们发现:处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城市是经济系列中一个举足轻重的环节,是一个经济学家必须倾注心血的新研究领域。于是,城市经济学便应运而生。但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国外一直没有提高到要从理论上加以充分说明的地步。而在80年代的中国,理论界出现了“中观经济”的理论范畴,把城市经济、区域经济包括了进去。这个未曾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新提法,却是一次重大的认识飞跃。按照西方经济学史的发展逻辑,自政治经济学盛行之后,近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从此便可以基本划分为三个重要阶段,即:微观经济学盛行阶段;宏观经济学盛行与微观经济学继续发展阶段;中观经济学产生发展与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继续发展阶段。这标志着经济系统和经济学系统趋于完善时代的到来。虽然现在“中观经济”的影响和知名度并不高,理论建树及其与实践的结合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但其潜在的生命力,正呈现出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城市经济学的创新与贡献,更是令人耳目一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进一步开拓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摆脱了“纯”经济研究的窠臼,加速推动了一般经济范畴内涵和外延的深刻变化;

——城市经济学重视空间结构的研究,不仅超越了仅以劳动

时间为理论基础，以价值平衡、实物平衡为主要方法的传统经济学框架，而且已经并将继续引起一般经济学原理的进一步发展变革；

——城市经济学高度重视城市公共经济的研究，打破了微观经济学重在企业、宏观经济学重在国家，缺乏宏观与微观、微观与微观之间联系纽带的研究局面，填补了传统经济学的空白；

——城市经济学对于产业发展的“外部经济”以及对环境经济和自然垄断行业的研究，明显突破了“市场一维”的观念束缚，极有利于市场经济和经济计划理论与实践的完善；

——城市经济学对城市区域经济研究的加强，进一步发现了城乡经济联系的整体性、必然性和重要性，更加清楚地看出了行政条块分割的弊端，进一步丰富了经济管理理论，对传统经济体制和机制提出了严峻挑战。

所有以上初见端倪的萌芽性成就，是否应该积极加以扶持、培育，促其开花结果呢？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的契机，难道在这里不是已经呼之欲出了吗？

联系我国实际，我们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中青年时期，城市经济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作用，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每当我看到国民经济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时候，马上会想到这与城市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而且重点应该在城市解决。例如，经济效益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引进外资问题、发展第三产业问题、科技兴国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问题等等，哪一项离得开“城市”这个“老大”呢？再如，城市自身存在的基础设施落后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交通事故和社会治安问题、拥挤嘈杂问题、居民生活问题、住房问题、就业问题等等，哪一项不与城市经济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不够、认识和政策跟不上、规划和措施不得力有密切关系呢？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新上任的市长和经济管理人员是很优秀的，他们也做出了很多成绩。但是，正

如他们自己已感觉到的那样，知识结构问题正在形成妨碍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主要障碍。而缺乏城市经济的科学理论知识，则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从实际需要出发，在兼顾理论体系完整的同时，重新考虑了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结构。在我以前为硕士、博士研究生编写的一些讲义中，曾将城市经济学分为三个部分：宏观城市经济学、微观城市经济学和城市经济管理学。经过认真反复的思考，我决心“打乱重来”，既彻底改造原有结构，也增添新的内容。特别是近几年来“考博”人数的增多，使我深受鼓舞。他们或是教学和科研岗位上的后起之秀，或是城市经济部门的年轻干部，在他们兴致勃勃地走近或走进城市经济学学科大厦的时候，自己感到教学内容必须进一步适应他们的需求，应该更系统更丰富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从本书的篇章结构和目录中，读者会发现我现在重点研究的六个方面问题是：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经济结构；城市经济环境；城市经济效益；城市经济区域；城市经济管理。做出如此选择的原因，主要是对以下来自实践问题的感受：

——中国经济落后，要把工作重点尽快转移到经济战线上来。这种可以理解的急切心情，常常只把重点放到经济增长上面，而对经济的全面发展顾及不够。虽然在理论上承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应吃子孙饭，但是，在急功近利的冲动面前，这种理想主义不堪一击。

——要全面、持续、稳定地发展经济，必须使经济有机体的各个部分和各要素之间互相适应、自动运作、自然演化、良性循环，没有斧凿痕迹，没有内部钳制和扭伤，即要优化系统结构。但是，城市里经常发生的各种令人头痛、难办的经济问题，无不与结构的“非优化”变态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利的经济结构，总是从根本上对经济发展起着长期的全面的不利影响和制约作用，不仅会使我们的“急切心情”永远难以化解，而且会使包袱越来越

越沉重，造成积重难返的局面。

——任何事物的生存与发展无不与环境密切相关。就像没有水、肥、土、种等要素的密切配合，任何庄稼都不可能生长或成熟一样，城市经济系统的存在和发展也与社会环境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程度联系。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囿于狭隘的经济观念，只习惯于提出简单的生产“硬指标”，为此冲刺的强劲态势往往像孤军深入之初的锐气一样，凌厉而不可阻挡。至于以后是否会陷于不利环境之中，谁又过细地去设想过？

——经济要长期稳定地健康发展，关键要抓住“效益”这个根本。然而城市“效益”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呢？到底该怎么衡量？只用企业的利润就可以概括一切吗？有没有用货币难以衡量的、不通过市场交换存在的“效益”呢？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除了劳动生产率因素外，投入产出的区位、规模和结构等因素对取得长期稳定的效益日益重要。现在，经济的发展已经提出了要“超越企业”看效益的视角要求。

——现代经济发展得如此之快，继提出了“超越企业”的视角要求之后，经济的整体联系性又提出了要“超越城市”看效益的视角要求，这就是大城市区域（或称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正如企业已不再是孤立的经济单元一样，“ $1+1>2$ ”的系统功能和效益，在城市范围内比在企业内有更好的作用效果，而在大城市区域内则效果更佳。区域经济的开放性和辐射性，迫切要求经济管理体制做出适应和配合。

——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是处于“划地为牢”的阶段。在许多方面对经济发展起着相当程度的制约作用，不仅未能促进“ $1+1>2$ ”的顺利实现，反而使“ $1+1<2$ ”的现象有可能经常发生。这些经济现实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我认为关键在于人的因素。人的认识和态度以及因此而凝固化的体制、制度、政策和管理方法等，这些可以视为“城市管理”范畴的要素

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城市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以上六个方面是目前中国城市经济在实践和理论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本书体系构建和内容调整的依据。但不是对原有讲义体系的完全否定，而是一种“兼容”的尝试：把城市宏观、微观和管理方面的问题揉和到新体系之中。也许，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和完善，还会再出现作为城市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宏观城市经济学、微观城市经济学和城市经营管理学。如果时机成熟，上述的六个方面也能独立发展成为城市发展经济学、城市结构经济学、城市环境经济学、城市效益经济学、城市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管理经济学。不过，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大批后来者的不懈努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能看到这一天的来临。

为了这本铺垫性的城市经济学著作，尽管我不遗余力地付出了大量心血，但完成初稿后，掩卷长思，仍发现她有许多遗憾之处：体系尚不十分完备，范畴、概念多处于“过渡性”状态，有必要进一步推敲；内容上，既有拖沓之处，也有过于简略甚至空白的地方；有些地方论证不足；有些资料已显得陈旧。此外，文字粗糙，也可能使读者感觉不到轻松和方便……总之，由于水平、时间、条件的限制，我的努力仍未能使自己如愿以偿，对此，也只好向众多读者致以深切的歉意。

不过，惟一使自己感到满意的是：本书的观点、方法、结论、意见等都是经过自己研究、培育的颇有感情的自家“土特产品”。“知之为之，不知为不知”。对于自己尚“不知”的部分，我都坦诚地提出要留给后来者填补。或许这种“一家之言”，对初学者独立思考会有一定的帮助。本书的内容，此前尚未发表过的约占一多半，在发表过的东西中，有的得到过社会的公认和嘉许，有的则受到过冷落甚至批评。经过这次“涂脂抹粉”后，它们共同出场的目的：一是希望能早日转化为“生产力”，对加速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有实际补益；二是希望能启迪后学，为研究城市经济的

莘莘学子提供必要的知识营养，充分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把他们迅速培养成出类拔萃的城市经济学者和治国治城的栋梁之材，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我焚膏继晷的动力。同时，也是我国城市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呼唤！

那么，这本书属于什么类型呢？就教学而言，我力求体系的完整和篇章节目的结构均衡，并博采众长，尽量介绍国内外最新科研成果；就现实需要而言，我又不得不有重点有选择地对我国几十年来的城市经济实践进行必要的总结，或长或短地表明自己的看法、观点，这样就势必影响本书的结构和写法。我力图使二者很好结合，但未作强求，以便读者能作透彻观察，各取所需，自由评说，以有益于本学科更快更好地发展。

在本书即将出版问世之际，饮水思源，我衷心感谢社会各面对我的帮助和教育。从50年代初的大学生活开始到现在，我的老师佟哲晖、唐启贤、刘长新、姚志学、薛俊杰、苍开极等教授就对我一直关怀备至，影响至深，使我感激不尽。我校的新、老领导于洋书记和夏德仁校长（在此书出版时，他已升任大连市副市长）邱东校长、郭长禄副校长、艾洪德副校长和学术委员会的专家学者如汪祥春教授、韩双林教授、谷祺教授等对扶持本书的出版曾起过关键的作用，我由衷地表示感谢。在本书的酝酿准备、编校阶段，本校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卢昌崇教授给予了积极支持和关怀；我的老友张厚方、吴伴君同志一贯的精神鼓励和实际帮助，也是我克服困难，坚持完成本书的重要动力，使我难以忘怀。

另外，这本拙作之所以能够形成，也是我向国内外先行者学习的结果。就高校而言，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干部管理学院、首都经贸大学、江西财经学院、山东大学以及华中师范大学的老少同仁们曾给予长期指导和合作；就科研社团而言，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等城市研究会、辽宁省